

赵 凤

四十四岁、女、翁古城张炉

乡翁南村小王屯小队

2009 年 7 月喝百草枯自杀

姜立修

四十三岁、男、翁古城石岭

乡槐树沟村下黄小队

2008 年 6 月喝百草枯自杀

曹运宽

六十三岁、男、翁古城曹崴

子乡四家子村柳店小队

2009 年 5 月上吊自杀

.....
孙惠芬 著
.....

关注自杀 关注自杀遗族
中国农民精神现状调查，十日何谈尽？

生死十日谈

013029194

I247.57
2421

孙惠芬 著

生死十日谈

I247.57
2421



北航

C1637589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死十日谈/孙惠芬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3

ISBN 978-7-02-009753-1

I. ①生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43288号

责任编辑 杨新岚 脚 印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00千字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8.875 插页3

印 数 1—15000

版 次 2013年4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753-1

定 价 2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开 篇

赵凤，四十四岁，女，翁古城张炉乡翁南村小王屯小队，
2009年7月喝百草枯自杀。

姜立修，四十三岁，男，翁古城石岭乡槐树沟村下黄小队，
2008年6月喝百草枯自杀。

曹运宽，六十三岁，男，翁古城曹崴子乡四家子村柳店小队，
2009年5月上吊自杀。

.....

如果将这个名单继续列下去，会有长长的一串，从2006年6月到2011年6月，五年时间，翁古城地区自杀死亡名册上，就有五百多例。这是中国其他县级市同比人口中偏低的数字，是世界同比人口比例的平均数。这个数字最初撞入眼帘，不由得为之震惊。在我越来越狭窄、只能通过媒体了解世界的专业作家生活中，除了中东地区不断出现的自杀式爆炸事件，中国南方神秘的富士康自杀事件，小人物、平民的自杀，似乎很少闯入我的视线，即使闯入，也很少了解其具体姓名。他们就像秋天枝头凋零的树叶，飘摇着坠入大地，之后悄悄地归于寂然。在翁古城计生委的死亡名单上，这些自杀者的生死日期确凿，名字醒目。赵凤、姜立修、曹运宽和三岛由纪夫、杰克·伦敦、张国荣没什么两样，可他们的死、死因，以及他们活

着的痛苦，死后亲人的痛苦，外边人很少知道。有一天，一位已经当上了当地政府领导的朋友问我，回老家忙什么？我说做自杀调查。他瞪着我，问：“谁自杀了？”我说：“不是谁，而是很多。”他以为我耸人听闻，惊诧地说：“很多？我怎么没听说？”

得以接近这些悄然陨落的生命，得感谢我的好朋友贾树华。她是滨城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教授。她拿到的第三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，就是做农村自杀行为的家庭影响评估与干预研究。关于农村自杀死亡者及其自杀遗族的研究和预防课题，树华已做了十二年之久。她带了自杀研究与预防课题组五个研究生，刚入秋就深入到翁古城的村村屯屯。我和我丈夫张申一同加入了这个团队。我加入，是当时我正在翁古城采风，看腻了太多热火朝天的莺歌燕舞；张申加入，是他当时正在寻找纪录片选题。他是滨城电视台国际部编导，自杀这个灾难性课题，他还从未涉及过。当然，也由于树华再三“诱惑”我们。

事实上，从有这个想法到真正参与调查，我在心里纠结了很久。我为此也不采风了，回到滨城家里，仿佛只要留在翁古城，就会被拖进去。在有了一些经历跨过天命之年这个门槛之后，我不再喜欢悲剧。曾经，我无病也要呻吟，无愁也要善感，好像不呻吟、不善感就少了某些人生滋味。我善于在很小的事物上挖掘痛苦、寻找忧伤，我迷恋失眠、恐惧、深夜里的惊悸，喜欢在快乐的人群里显出沉思的表情，在光明的背面探测潮湿的阴影，似乎这才是艺术的人生。可是变化怎么就来了，一点儿都不知道。岁月最是和平演变的高手，不知从哪一天起，我不但不喜欢从生活里挖掘悲剧，连艺术里的悲剧也要躲避。电影《2012》、《唐山大地震》、《南京！南京！》，宣传得再好都坚决不看。如果身边人的悲剧不得不面对，那么也尽量让自己麻木，不去用心体会。我一直以为我在堕落，作为一个作家，

我的心灵在衰退。当一个人觉得健康地活着比创作更重要，那一定是心灵衰退的表现。然而我并没因此而焦虑，反倒觉得上了一个台阶，悟得了人生要义。这个秋天，要不是树华一次又一次电话动员我们，要不是张申每天回家都念研究生们发来的短信——“张老师，你和孙老师啥时候来呀？”我很难跨出这一步。

2011年9月10日，我终于跨出去了。在走出楼道、等待张申把车开出来那一刻，我双手合十，冲东北方向的翁古城老家，长久伫立，我在心里说：等着吧，我们马上就到。

谨以此书，献给我的故乡，我的大地，我的乡亲父老。

感谢我的好朋友贾树华教授，没有她的支持、鼓励，就没有我此次的倾情书写。她总是会跟人分享自己多年自杀死亡研究的心得：海再咸涩也能提炼出晶莹而有益健康的盐，即使受挫甚至痛苦的人生里，也蕴藏着积极的力量。

孙惠芬

2012年12月28日

第 壹 日

1

初入村庄

一泡尿要了两个人的命



初入村庄

因为和研究生们约定七点在翁古城张炉乡会合，我和张申四十点五十就从滨城出发。那时天还没亮，城市街道上车辆很少，我们的车就像离了弦的箭，十几分钟就冲上了黄海大道。因为和张申拥有同一个故乡，这条逶迤在黄海北岸的回乡路我们不知走过多少回。最初是 201 国道，后来变成了高速公路。我们的目的地总是连着路的两端，要么是从滨城到翁古城，再到青堆子；要么是从青堆子到翁古城，再到滨城。在乡下时，以为这条以翁古城为连接点的路通着的远方，就是世界。可在城里住了一些年之后，猛然发现，乡村才是世界。在城里待烦了、待久了，最想回的就是乡村。

张炉乡政府驻地我们都不陌生，它原来叫烈士山，坐落在翁古城境内南端，属沿海乡镇。201 国道像穿糖葫芦一样把它和青堆子穿起来，每次从翁古城城区出来，必经它的心脏。这个心脏这些年来一直在变，先是改掉烈士山这个光荣而不吉祥的名字，换成张炉，之后又把它西边的菊店乡、东边的观海乡合并进来。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里，总有人在设计着历史，改变着历史，尽管你永远无法弄清那个具体的人到底是谁。但不管怎么变，在我们心里，它都不过是个指示牌而已。当见到路两侧商业街的门楣上出现“张炉”时，就知道离我们的家已经不远了。

然而这一次，我们不是路过，张炉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。

在一个熟悉却从未下过车的地方下车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就像一个总是越门而过的人终于踏入了亲戚的家门，新奇中夹杂着一丝惭愧。倒是这里的“亲戚”并不在意我的惭愧，大大咧咧迎上来，“张老师、孙老师，你们可来啦！”

说起来，课题组的研究生和张炉毫无关系，他们来自内蒙古、哈尔滨、铁岭、朝阳、山东，就因为滨城医科大学读精神医学和应用心理学硕士，就和这里有了关系。不但有了关系，还是深切的、血缘一样的关系。当他们冲过来把我和张申围住时，我已经有些认不出他们了。慕红、居颖、钱薇、王月楠，一个月前在树华专设的送行晚宴上，她们个儿顶个儿面色白净，目光清澈，个儿顶个儿有着一头精心养护的披肩直发，那直发随她们脖颈的转动飘逸，有一种藏不住的青春之美。可是眼下，她们皮肤粗糙了、黑了，化妆品因为渗不进去，在表面形成一层霜花，头发不但不再飘逸，且傻傻的锥子一样被束在头顶。此时的这些研究生们，如果不细看，完全就是一副乡下孩子模样。就连唯一一个男生吕岳成，也没有了原来的清爽帅气。

当然，我没有把真实感受说出来。临行前树华在电话里叮嘱过：“姐，见到他们一定要给他们鼓劲儿，可坚决不能让他们泄气呀。”于是我说：“怎么，怎么你们都变啦？一个个都比原来……成熟啦。”可他们根本不在意我怎么说，只顾争相上来握手。领队慕红一边跟张申握手，一边郑重强调：“张老师，可不能开车下去，我们不能太兴师动众了，你把车停在乡政府，咱们大家挤在一辆面包车上。”

如果不是有幸加入这个团队，我永远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车。它看上去像一只脸口很短的鞋子，鞋身又窄又长，鞋腰也不高，可拉开拉门，却能塞进七八个人。实际上我们后来到的所有乡镇，

都能租到这样的车子。它比轿车拉人多，是专为团体租车者准备的，按天论价。这个微型面包车让我见证了世界的丰富性，可是我却为此付出了代价。离开乡政府拐向一个坡路，七八个人球一样左右滚动，觉得好像坐在电影院看3D电影，胃的最深处也在翻腾着。

然而，就在晕车的感觉从心底往外翻涌时，我一直为之恐惧的东西也在车上蔓延开来。它一开始出自一个细弱的朝阳口音，之后又加入了尾音很重的铁岭口音，再之后又加入了哈尔滨口音。一个多月，他们听到了太多的悲苦，他们没有办法不让自己释放。

一个男孩十七岁就自杀了。他念不进书，退学在翁古城木器厂干临时工，爱上一个大他五岁的女子，那女子不答应他，他就要换工作。回家跟母亲讲，母亲说死不同意，不但不同意，还没好气地骂了他。结果，在离家返回翁古城的路上，他摸出从家里带出来的百草枯，一口气喝下。在医院抢救时母亲赶到，他睁开眼睛跟母亲说了最后一句话：“妈，我还能活吗？我不想死。”

一个男子得了胃癌，家里没钱治疗，想服毒自杀。可是他的食道已被肿瘤塞满，根本喝不下药水，最后只有拖着枯瘦的身子爬到山上上了吊。

一个七十五岁老头，强奸了十五岁女孩。女孩怀孕，他没脸见人，喝百草枯自杀。

.....

车在一个院子里停下来，我冲下去哇哇呕吐。我知道我吐出来的，除了食物，还有什么——一个母亲耳边每天响着“妈，我不想死”的话！聪明的慕红察觉到她碰到了做母亲的最脆弱的神经，轻拍我的后背，不住声地说：“孙老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

彻底吐出来，在一个阔大的院子里慢慢站起，才发现眼前是张炉乡张店村村委会。橘黄色二层小楼前，挂着两个牌匾，一个写着

中共张炉乡张店村党支部，一个写着张炉乡张店村村民委员会。这样的小楼，下乡采风时就已见过，2007年滨城市政府拨款统一兴建，村村都有。它一水儿的尖屋顶，一水儿的红色屋瓦橘黄色外墙。它区别于辽南乡村千百年来房屋，在野地中央拔起。这深扎在乡村土地上的西洋景观，使我不得不相信现代文明向乡间推进的脚步。多年来，我一直以为，村是中国行政体制中最小的政府。可是下乡采风才知道，中国最小的政府是乡镇，村没有政府，村干部之所以民选，就因为村属于自治。而树华这个访问项目实施起来困难巨大，也因为村干部是民选的，他们不得不顾忌村民们的感受。

怕村干部敏感，慕红没让张申跟进去，我俩在院子里面面相觑时，张申焦虑得直跺脚。在他看来，即使是拒绝，拍下来也是有意义的。见五分钟过去了还不出来，我冒胆走了进去，循着楼道里嗡嗡的声音，我来到二楼。在楼梯口正对着的一个办公室里，一个腰宽体胖的大个男人正冲五个研究生呜呜嗷嗷比画。站在旁边听一会儿才明白，他是村书记，拒绝采访。他说：“什么这个大学那个大学，弄不好都是骗子。前一段来了一个豪华车队，打着国家和政府旗号，说来给中老年人检验是否缺钙。村里一听是好事，帮忙召集老百姓，由他们挨个检查，晌午还供他们饭。他们饭后拉来一大卡车钙片，大张旗鼓卖给老百姓。可是他们人还没走，公安局的车就开进村子，把他们全部抓走了。结果可倒好，俺挨领导好一顿批。”研究生们大眼瞪小眼地看着，慕红不甘心，继续解释，说我们绝不是骗子，我们既不检查也不卖药，我们只是访问自杀者亲属，做个评估，看看他们的生活是个什么状态。

慕红避开了国家和政府这样的字眼，努力把话说得软和顺畅。可穿一身水红衣裳的妇女主任仍然不依，说：“什么状态？家里有人死能是好状态？状态不好政府能救济不成？再说啦，你揭人家伤疤，

谁能愿意？”

走访了一个多月，这种情况慕红想必见多了。她没因此退缩，依然和风细雨说：“以后，国家会给一些救助政策，比如心理疏导呀、干预呀，这都得有个调查评估。访问每个人所耽误的工夫我们还给四十块钱误工费，如果有情绪问题我们可进行很好的咨询和疏导，我们都是国家高级职业心理咨询师和精神心理专业方面的研究生。”

“它不是钱不钱的事，你是在揭人伤疤。”

虽然年轻的妇女主任一再强调不能揭人伤疤，可当听说每个被访者有四十块钱，她还是焖住了。顺着焖住那股气儿，她看了看村书记，并接过名单，慢慢坐到椅子上。后来我知道，这四十块钱，不但是得以走近被访者心灵的秘密通行证，也是争得村干部配合的重要条件。没有谁会比他们更了解四十块钱对灾难家庭的重要性，也没有谁比他们更知道在这秋收的季节找人有多困难。踩着四十块钱开辟的道路离开村部，我感到有些心虚。长时间注视张申，某一刻，我觉得我俩是狗仗人势，是入伙抢劫。因为我们不但没有一个正当的身份，还是从他们重新撕开的伤口上寻找财富。

可是已经来了，已经没了退路！



一泡尿要了两个人的命

在这个金灿灿的秋天，在张店村西柳屯，我们撕开了第一道伤口。目标人是一对婆媳，她们于2007年5月，双双自杀。在研究生们的专业术语里，称自杀者为目标人，能采访到的自杀者亲属为被访者。那一天，我们真正接触到被访者，都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了。自2006年到现在，张店村的自杀名单上共有五人，四人服毒，一人上吊。可是要找到目标人的亲属，确实如妇女主任所说，非常困难。他们不是到外地打工去了，就是上山干活去了，而上山干活，又不知道他在哪一片山上。死的人死了，活着的人总要活着，寻找奔生计人们的踪影，面包车在乡野上不知跑了多少个来回。

这是一座外表相当气派的房子，青石灰瓦，院墙高筑。它坐落在一片野地中央，被一片在风中摇晃的苞米秸隔着，远远看去，显得生机盎然。不知是在乡路上转得太久，急切的心情一点点消耗了某种恐惧，还是眼前充满生机的房子具有某种镇静作用，绕过一条杂草丛生的小道，走近死过两个女人的家门，我居然毫不紧张。

一切都再平常不过。妇女主任在门口“二叔二叔”大喊两嗓子，一个男人就从院子里的苞米堆前站了起来。上午第一个联系的就是这个男人，他个子不高，肩膀微微前倾，灰呛呛的头发贴在头皮上，给人逆来顺受的无奈感。但当他拉开铁门来到摄像机前，目光扫向

我们时，却顿时有了精神，仿佛早就知道在某个时候，他就该是一场戏的主角。这令我深感意外。尤其在慕红向他讲述找他的理由，说国家关心这样一个群体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时，他手往院子里的苞米堆一指，示意张申说：“照吧，就照苞米堆，今年大丰收，俺收了二十多车。”好像那样他会给国家交一个完美的答卷。

实际上，在后来的日子里，我们见到很多这样的被访者。他们深陷灾难，却并没被灾难击垮，只是他们为什么没被击垮，各有各的原因而已。套用托翁那个著名的家庭论述，灾难到来是一样的，承受灾难的能力却各有各的不同。

一院子的苞米，扒出来的堆在左侧，露出金黄色的米粒，还没扒出来的堆在右侧，就像一群等待飞翔的鸟。看到它们，我倍感亲切。童年时，只要到了秋天，就跟着秋收的大人，天天滚在苞米堆里。在那些从苞米身上扒下来的叶子下面，我听到过来自遥远世界最奇妙的声音。只要你回到乡村，总能感受到生活中那些亘古不变的东西，这东西不是别的，是收获的喜悦。然而现在，在这个孤寂的院子里，我不但感受不到秋收的喜悦，而且听到了一声惨叫，一曲哀怨，经历着一个久久不能释怀的伤痛。

他叫于吉良，今年五十四岁。为了不耽误被访者干活，慕红把妇女主任和其他研究者打发去了另一家。坐在苞米堆上，就开始了访谈。虽说他不是个善于表达的男人，说话时舌头在嘴里打卷儿，可是讲起那一天的事儿却极其流利，好像他在内心里已经讲过多少遍了。“那是多会儿？是前年五月，记得打芸豆架了嘛。那天头晌，媳妇上河套洗衣裳，把孩子扔给俺老婆看。媳妇从来不干活，一干活就躲，俺老婆性急，干起活来不让劲儿，上园子里打芸豆架去了，把孩子自个儿扔在炕上。可俺媳妇来家一看，孩子在她屋里，抹了一炕屎，立马就火了，指着地当央的狗骂老东西不要脸。俺老婆一

辈子没叫人骂过，哪能听得了媳妇指鸡骂狗，就从园子里回来问媳妇骂谁。媳妇本来就要尖儿，哪经得住问，疯了一样扑到俺老婆怀里扯把衣裳。俺老婆一天三顿饭侍候她和孩子，什么活都不用她干，她还冲她动手，一气之下，就上厦子摸出一瓶百草枯喝了。她喝完，怕媳妇喝，还把家里所有农药都倒了。谁知媳妇看婆婆躺到院子里，吓得嗷嗷叫，一边叫一边找药。到底在灶屋后窗台上找来一瓶卤水，就是点豆腐的卤水……”

“百草枯太厉害了。邻居上山把俺喊回来，俺老婆已经死了。俺儿把媳妇送医院抢救，活了七天。”

一泡尿要了两个人的命，这听起来实在不可思议。在于吉良简短的讲述中，蜷伏了许多隐秘的皱褶，就像我们曾经见过的大山的皱褶，那里生长着各种野草和树木。只不过在婆媳这两座大山的皱褶里，生长的不是野草也不是树木，而是情绪，过日子日积月累的情绪。媳妇从来不爱干活儿，婆婆一干起活儿来就性急，这两股来自不同方向的河水，冲撞到一起，必有浪花。上河套洗衣裳虽然也算干活，可同是干活，和打芸豆架比，精神内核有本质区别。芸豆是夏天青黄不接时农村最重要的蔬菜，许多从辽南农村走出来的人都有一个抹不掉的记忆，就是在大铁锅里炖土豆芸豆。打芸豆架一般都在五月，农时不等人，尤其对一个把过日子视为生命的女人。而上河套洗衣服，则是躲避干活的最好方式。我少年时就以此为由躲避过推碾推磨各种农活。眼前是流淌的河水，身后是刮过的轻风，时而停下手里搓洗的衣服，盯住河水，那亮晶晶的水里，还会映现出一个又一个波光粼粼的梦想。一个刚嫁过来的二十几岁女子，未必嫁人就断了梦想。

我的联想很快得到了证实。那时我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她好像早已经来到院子里，嚷嚷道：“小死鬼儿太不是东西了，

一天到晚搽脂抹粉，除了上河套洗衣裳就是玩电脑。你不干活就不干活，俺姐说了，家里没有闺女，就把她当闺女养活。可是你还要脾气，你还动手打人，你说气不气死个活人！俺姐为什么喝药，不就是想看看我死了你怎么过吗？俺姐把药都倒了，就是不想让她死，叫她过过看！谁知她捡了便宜，也撒了手。你说俺姐怎么就没想到后窗台还有一瓶卤水。”

死，不是失败，而是胜利。这里隐藏了婆媳之间怎样的纠结，真是难以想象。被身后粗哑的声音吸引，大家纷纷侧过身，张申也转过了镜头。可是这个包着翠绿头巾的女人却像只机敏的燕子，迅速躲过镜头，一边吵吵“白照俺白照俺”，一边跳到房屋门口的台阶上。

为了不影响慕红继续采访，我也跨上台阶，用目光阻止她介入的同时，也表达了自己愿意和她多聊聊的愿望。其实我更想从她那了解一些有关婆媳关系的细节，很明显她对这个家庭的事情了如指掌。

如果不是这个绿头巾女人半道加入——她是于吉良老婆的妹妹，家就住在前街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就这么不设防地走进一对亡人曾经生活过的屋子。走进屋子，才想起树华常说的一句话，女人家女人家，没有女人的家简直就不是家。那悬浮在院里院外的生机，不过是往昔生活的再现。掩盖在一堆零乱的柴草、鸡蛋壳底下平坦的水泥地，一炕肮脏的被褥、衣裳底下花色漂亮的人造革炕垫，挂满了腰带毛巾之类杂物的乳白色大衣柜、高低柜，高低柜上依然崭新的松下电视，电视边上已经卷曲的婚纱照……美好的往昔与凄惨的现实重叠，你不得不对不负责任的毁坏生出愤恨。绿头巾女人把罪魁祸首直指媳妇，指向媳妇的妈妈：“不叫小死鬼儿妈妈护着她闺女，这个家早分了，何至于把俺姐气死？！你不知道，拌一回嘴，